

HUABEI DE JIHUANG

华北的饥荒

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

[美] 李明珠 著 石涛 李军 马国英 译



人民出版社

HUABEI DE JIHUANG

华北的饥荒

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

[美] 李明珠 著 石涛 李军 马国英 译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邵永忠 王建虹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黄桂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美)李明珠 著;石涛, 李军,马国英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ISBN 978-7-01-013509-0

I. ①华… II. ①李…②石…③李…④马… III. ①自然灾害-研究-中国-1690~1949②救灾-研究-中国-1690~1949 IV. ①X432②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0016 号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Lillian M. L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
HUABEI DE JIHUANG: GUOJIA, SHICHANG YU HUANJING TUIHUA(1690~1949)

[美]李明珠 著 石涛 李军 马国英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6.75

字数:600 千字

ISBN 978-7-01-013509-0 定价:9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译者序

社会的进步总会带来人类认识的革新，甚至是革命性的更迭。但就灾害而言，几乎在人类社会出现伊始，便被赋予了一个标志着苦难和噩梦的脸谱化特征。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自然赋予其情感，并由社会将个体情感加以规范形成社会情感，以此构建起诸如“天若有情天亦老”般的社会道德体系。基于人道的审视，灾害为人类带来的无尽伤痛，引发了整个社会的集体仇视。这一结果不仅规定了人类灾害认知的潜意识，并且奠定了其学术化研究的感性基调。

不可否认，自然灾害为人类社会带来的除了心灵伤痛之外，另一结果便是经济损失引发社会发展放缓甚至衰退。然而，抛开人类的情感因素，从一个长远视角来审视，灾害的发生确乎存在着些许合理的因素。

我们暂且不考虑“危机—应对”模式引发的技术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整个社会经济长期的间接推进作用。单就古代社会经济增长的视角来看，令我困惑不解的是，按马尔萨斯陷阱的说法，古代社会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导致长期经济波动的存在，而灾害则成为解决引发经济危机（事实上是人口危机）中最核心因素——人口因素——的自然手段。^①

问题在于，马氏经济波动曲线并非是水平区间内的简单重复，社会进步的事实表明，经济波动的均衡线存在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向上变化的斜率。这样，某次波谷的萧条实际上是下一次更高水平波峰的必要准备，那么，作为调节手段、与波谷伴生出现的灾害除了会带来人口死亡和经济衰退等显性作用之外，还会有其他隐性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呢？这一命题对于中国

① 参见[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马寅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这个被称作是“饥荒之邦”（马罗立语）^①的国家来说，应该具有更为特殊的含义。

换言之，如果把社会经济的运行当作一个由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综合发展的有机体，那么灾害是这个机体中的毒瘤，还是其活动赖以维系的必要环节？所有这些都需要抛开感情色彩的理性思维。

一、灾害与经济的长期波动

近年来，灾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被提到了一个宏观层面进行考量。西方和中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开始将长期经济发展作为灾害研究的宏观背景，将散见在史籍、档案、方志等文献中的数据进行汇总，并运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进行量化分析。^②其中，灾害与经济运行各项指标之间相关关系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窗口也受到了关注。随着学者们对粮食价格与市场整合问题的重视^③，灾害与粮食价格、市场整合等方面的研究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新计量工具的使用，使得原来无法想象的研究变成了现实，灰色系统理论、模糊数学等被运用到解决古代数据的支离破碎和不确定性中，有助于将这些数据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处理，大大增强了数据的处理能力。^④近年来，协

① [美] 马罗立：《饥荒的中国》，吴鹏飞译，民智书局1929年版。

② 其中，对古代GDP的核算成果不断涌现，如麦迪森在三部著作《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均对古代中国的GDP进行了核算。国内学者也进行了这一方面的研究，2008年国内“清华—北大中国经济史沙龙”上，清华大学历史系李伯重教授发表了《1823—1829年间松江府华亭—娄县地区的GDP研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管汉晖博士的发言以《明代GDP及增长试探》为题，利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明代GDP，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博士在题为《宋代中国市场经济的长期变化：物价、工资、贸易和财政税收》的报告中，对宋至明清的GDP进行了长时段的对比分析。

③ 吴承明先生在其《经济史：世界观与方法论》一书中对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古代和近代市场整合度问题进行了系统介绍。

④ 吴承明先生也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没有一个古今中外都通用的经济理论。经济史凡能计量的都尽可能计量，乃至模糊数学；有时比较值更重要于绝对值，这是史的特点。收录于张伟保、黎华标编的《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1999年。

整理论、空间计量等较为先进的方法也被用于对中国古代市场发展的研究方面。^① 2008年,我们将清代200余年山西自然灾害与粮食价格的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度比较分析时便惊奇地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度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②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数学研究所对于粮食价格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③

200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索思摩学院历史系教授李明珠(Lillian M. Li)博士的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1990s*^④ 一书,便系统总结了前期诸如吴承明、王业键、罗威廉、濮德培等人对于中国清代江南、四川、甘肃等地市场整合度的研究^⑤,在大量搜集粮食价格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变异系数、无量纲化、线性回归等方法,对清代直隶地区的市场与粮食价格进行了量化分析。

李明珠教授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落脚到彭慕兰等人基于中西比较的经济核心区——中国的江南^⑥,而是有意将着眼点放到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直隶及其周边地区。由于中国古代漕运保障京畿的功能,这一区域的粮食供给往往并不受本区域内粮食产量的制约。这样,市场的意义便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同时,政府通过干预市场解决饥馑的能力通过市场整合这一概念也会变得更为清晰和明确。

灾害的发生可能导致饥馑,饥馑意味着粮食的稀缺、居民获得粮食的权

① Shiue, Carol H. and Wolfgang Keller. "The Origins of Spatial Interac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Rice Markets, 1742—1795."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7, 140 (1): 304—332. Shiue, Carol H. and Wolfgang Keller. "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 (4): 1189—1216.

② 李军、李志芳、石涛:《自然灾害与区域粮食价格——以清代山西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2期,第40—51页。

③ 陈仁义指导的中正大学数学研究所的硕士毕业论文,薛汝芳的《18世纪清代粮价之统计分析——晋皖江浙地区》、余登铨的《清代粮价数据之统计模型比较》、吴盈美的《18世纪清代粮价之统计分析——长江以南地区》运用EViews等软件处理了相关粮价数据,结论与我们的计算基本一致。

④ 本次只翻译1690—1949年部分。

⑤ 在罗斯基与李明珠主编的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一书中第一部分中收录了上述作者的相关文章。

⑥ [美]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利逐渐丧失。^① 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在市场环境下，作为稀缺商品的粮食，其价格势必会随着稀缺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两者应该呈正相关。古代社会中，能够影响到这一变化趋势的因素主要是政府的调控，并且，这种影响的作用并非能够大到足以消弭它，更多的是延缓其发生的过程，或减轻饥馑发生的程度。换言之，除市场之外，政府是饥馑与价格因素相互关系中最大的变量。

李明珠教授首先从市场的流通环节入手，通过市场上粮食价格的波动，计算出影响市场整合的相关系数和变异系数，进而分析 18—19 世纪间市场整合度降低的行政区划因素。从环境地理区划的角度，考察华北平原不同自然环境的区域间市场整合的情况。她把华北分为四个区，计算各区每连续两年间粮食价格变化的同步性，求得区域间市场整合情况。通过文献记载分析这些区域间粮食价格相关度变化的两种趋势和成因，将数据结论归因为交通运输等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

影响市场价格的另一个重要环节便是生产。排除区域间粮食流通的因素，一个地区粮食产量的增减可以代表该地的市场流通量。因此，粮食收成也被纳入了李明珠教授的研究体系中。她通过建立模型来检测收成对价格的影响，结果发现在 18 世纪地方上的收成对天津府的小麦价格影响很小，在 1790—1860 年间略有提高。纵观清代直隶一省，除天津以外，由于交通运输条件不良，其内部粮食市场整合程度并不高。而从直隶与周边地区的市场整合情况来看，其与奉天的整合度较高，1860 年以后与长江下游的整合也逐渐增强。通过对省内和省际以粮食为核心的市场整合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作者得出了尽管清代已经出现了全国性粮食市场整合的现象，但直隶省内的市场整合没有体现出显著相同趋势的结论，并指出 19 世纪通商口岸与内陆间经济发展存在根本的差距。

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国家对粮食价格的控制，这也是古代社会政府公共事务和经济管理职能最为显著的体现。自战国时期魏国李悝施行平糴法以来，几乎各朝的官箴书中都有对地方官员常平和赈恤职责的记载，清代自然也不例外。^② 李明珠教授在本书中指出，清代皇帝与官员在重视利用市场力

① [印]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② 突出表现是有清一代荒政类的书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要丰富，而且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皇帝钦定并颁布全国的荒政史籍《钦定康济录》。

量来提高物品流通的同时，也会在市场自然调节功能失效时，采取果断的干预手段，尤其对国家利益攸关的粮食市场。她将18世纪粮价趋同的情形归结为是在政府主导调节供需下的“假性市场整合”（false market integration）。这种假性市场整合是政府通过常平或粮食运输以及对价格的直接干预形成的。另外，政府无意识的行为也会使粮食价格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如1841年以后天津开埠使得当地价格与收成的相关性开始下降。

吴承明先生曾经对研究市场整合的意义有过评价，他说：“市场整合（market integration）或称一体化，是指一个区域乃至一国的市场由贸易网络连接，形成供求比较平衡的状况。”^① 其研究的基础是通过一定时间内的连续价格数据，分析价格的同步性或者是与平均价格的离散程度。然而，这些数据只能反映出不同地区市场上价格因素的变化情况，如果单纯用计算得出的数据来说明市场整合度的问题，势必会忽略非市场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因此，“假性市场整合”概念的提出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此外，量化的优势不仅仅在于能够更清晰地说明某一经济现象的原委，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将不可能进行统计的项目通过某种计量手段和经济学方法展现出来。正如李明珠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对清代直隶地区粮食价格和市场整合度的研究，能够弥补由个体贫困引发的长期的、非显著性的局部饥谨发生的不确定性情况研究中存在的缺失。基于古代文献中数量概念往往比较模糊，这些问题在以往对灾害研究中被堂而皇之地忽略掉了。因为，人们对于生活必需品的交换权利问题很难纳入“资治通鉴”史观指导下的古代历史记录者“秉笔直书”的视界中。而这些情况恰恰是比大型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为深刻。得益于清代近两百年的粮价数据，我们可以通过古代社会经济最为活跃因素——粮食价格，将长期的小农贫困状况纳入市场环境来进行考虑。这样更加贴近灾害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更真实的影响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李明珠教授对中国灾害的研究并非只是建立在以往自己对灾害始终如一的研究上，而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长期关注之上。上世纪70年代，她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丝绸出口方面的问题，并于1975年以《1842—1937年江南之丝绸出口贸易》（Ki-

^①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4页。

angnan and the Silk Export Trade, 1842—1937) 一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6年后，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1842—1937*），在书中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①

1991年，她开始把研究视角逐渐转向中国灾害史及相关方向，并连续发表了《中国饥荒中的生与死：1935年黄河大水时的杀婴分析》（*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②、《1736—1911年直隶省的粮食价格》（*Grain Prices in Zhili Province: 1736—1911*）^③、《清朝对京师粮食安全的保卫：国家、市场和警察》（*Guard Beijing's Food Security in the Qing Dynasty: State, Market, and Police*）^④、《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性分析：1738—1911》（*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s, 1738—1911*）^⑤，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她将严谨的史学方法和量化分析工具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研究体系和思路。

与此同时，她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进行审视，1992年她与罗斯基等多位学者合作出版了《中国历史的经济之维》（*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对经济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该书所展现的内容被誉为是“已被中国经济的历史（the history of China's economy）所反复书

① Li, Lillian M. *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1842—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该书中译本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美]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徐秀丽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② Li, Lillian M.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91, 33 (3): 466—510.

③ 收入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一书，该文用回归分析法考察了直隶省小麦、小米、高粱的季节差价，但也发现一些难解之谜。她指出，可能季节变动的模式在每个地方都有差异，因而，后来的研究者一般不把季节差价的大小作为市场整合的标志。

④ Li, Lillian M. and Alison Dray - Novey. "Guard Beijing's Food Security in the Qing Dynasty: State, Market, and Polic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9, 58 (4): 992—1032.

⑤ Li, Lillian M.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s, 1738—1911."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00, 60 (3): 665—699.

写，然而还没有被中国的经济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所涉及的观念”^①。

正是基于对中国古代经济长期波动情况的宏观把握和对量化研究的精确掌握，李明珠教授在对直隶地区灾害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正如赖建诚教授所言：她的研究“摆脱简单的人口/粮食（马尔萨斯陷阱）思考模式，将国家、市场、环境三者交杂在一起，做出多面向的长时段分析。把自然环境的变化、农业资源的增减、经济与社会变迁、朝廷的努力、人民求生的意志，这些复杂的面向结合在一起”^②。而这种研究无疑对中国的灾害史学乃至经济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借鉴的方法。

二、环境史观

中国传统观念中，天、地、人三者之间被描绘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古代史学也被赋予了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某些隐含规律的职能。抛开其“感应说”等带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内容，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至今仍是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

无独有偶，上世纪中叶，以费尔南多·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长时段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心态史^③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这种天道人事观的延伸，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为宗旨的新环境史观，从兴起迄今已有三十余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一套超越“自然”与“人类（社会、文化）”二元分立的传统思维模式，并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为基础，构建出一套“人类——环境互动论”的生态史观和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的优势是将自然界的因素作为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变量抑或是将人类社会当作沧海桑田变迁的影响因子，能够开阔史学研究的视野。放弃了意识形态中的教条化史学

① Rawski, Thomas G. and Lillian M. Li.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2.

② 赖建诚：《李明珠论华北饥荒》，《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第60期，第169—176页。

③ 即长时段的构造史，代表性研究成果为〔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观^①，有助于更为客观地审视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性状与形态。然而，环境史研究对于研究者的知识背景要求甚高，它既要求有生态学、地理学、物候学等自然科学的学科背景，同时也必须对历史学有精深的了解。就目前的研究来看，真正做到将二者紧密结合的成果并不多见。

李明珠教授似乎并没有刻意将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引入自己的研究。为了说明清代直隶所辖各区域内粮食价格与市场整合度这一命题，她首先从中国天、地、人的观念说起，通过气候、河流、地形地貌等因素，将这一地区划分为四个生产单位。某一时段某一区域的自然环境是长期积累所引起的，一旦与人类社会有所交叠，人类为生存所进行的改造自然的活动便成为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李教授对清代直隶自然环境的考察上溯到战国时期人类在这一区域的活动，指出，清代直隶地区的自然环境受长期人类活动的影响，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一旦政府疏于管理，便会发生灾害，这也是清代这一地区水旱灾害周期性特征与君王统治周期（reign cycle）规律相契合的历史原因。

尽管中国台湾学者刘翠溶教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她认为每位皇帝即位之初都会有较大水灾发生的情况并不尽然，因此“君王统治周期”的提法值得商榷。^②但是，李明珠教授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似乎并没有给出十分肯定的结论，并且在前面加上了一个限定，即“前一朝末期对河流治理不加重视的后果”，进而又做出了说明：“对清代而言，水灾发生的次数在整个纪元的末期骤然增长，从1870年起，直隶地区几乎每年都有水灾暴发。”^③

作者着力将自然因素中的气候、土壤、河流系统、物种和社会因素综合考量，尤其是对海河流域各支流的原始状态和变更情况等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弄清水系特征形成的原因后，她首先从政府治河开始论述。与其他王朝一样，

① 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

② 刘翠溶认为：“皇朝的时间长短不一，例如，表中列出乾隆年间直隶发生8次大水灾，每次受灾的县数都不少于康熙七年的50县，而乾隆五十九年的水灾更多达121县，较乾隆二至四年的87、96、72县为多，但这是在乾隆末年而非初年。又如，同治朝只有十三年，发生于十至十二年的大水怎么可说是在该皇朝的开始？”见刘翠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8期，第557—570页）对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1990s* 的评论。

③ Li, Lillian M.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 1990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1.

清政府对河流的治理予以了高度的重视，皇帝亲力亲为的情况并不少见。自康熙朝至清末，皇帝及重臣都对直隶水利进行过规划和治理。道光朝以后还出现由地方官发起、并由地方绅士参与的水利工程。政府的重视对于救荒和自然环境来说未必是件好事，一方面，在经营水利工程的过程中，官僚机构的运作状况远比水利工程本身复杂得多，与以往的经验相吻合。另一方面，治水的成功只是在短时期内缓和了人地之间的矛盾，但河川沿岸与水泽附近的土地利用愈密集，人口聚落愈稠密，又加剧了水灾的风险。因此，李明珠教授得出了“晚清河流系统的退化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周期性过程，更是几个世纪以来长时期的环境退化累积形成的一个顶点”^①的结论。

李明珠教授对环境史论述的着眼点并非仅就环境本身的变迁情况而言，她把自然条件作为进一步研究直隶地区灾害、粮食价格、市场整合等问题的一个变量。因为京畿地区漕运、粮食储备等因素都能够给我们造成市场整合度高的假象，而导致粮食价格波动或子区域间粮食价格差异的原因，除气候、土壤等粮食生产条件外，河道的壅塞、道路的毁坏都可能成为影响价格波动的“罪魁”。

三、传统历史主义的方法

应该说，李明珠教授的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分析最为全面的灾害史学的鸿篇巨制。经济学的思维模式、计量的方法，加上环境史观的研究理念，已经足以让这部著作成为灾害史研究的一个经典。但是，作者并没有将这些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作为一种炫耀，因为，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自身对史料的充分把握和分析上的。

作者并没有抛弃传统历史主义的研究范式，即便是在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时，她首先对清代粮食价格记录的真实性进行了分析和考证。为了说明清代直隶粮价记录的可靠程度，她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清代粮价、收成奏报体系，并对现在研究中有关奏报粮价的质疑进行了解释，她认为，“直隶是政治中心，处在中央政府的严密的监管之下，所以直隶省的粮食价格数

^① Li, Lillian M.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1990s*: 31.

据相对是最准确和完整的。”“18 世纪的数据和 19 世纪的一些数据还是很准确的。”为了谨慎起见，她把所得到的直隶 78% 的粮价数据中，“因为地理位置上相对次要，所以值得怀疑”的宣化、承德两地的数据，没有列入计算和分析中。

荒政是中国历代政府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从《周礼》到《救荒活民书》、《钦定康济录》，再到现代的研究，传统灾害史学无一不将其作为论说的核心内容。李明珠教授也着力对清代以降的政府救荒措施进行了描述。

李教授侧重对政府赈灾步骤的探讨。她将不同等级的灾害作为背景，探讨官员在报灾、勘灾、检覆、查赈等的整个流程。北宋后期，中国的政府减灾已经形成了相对模式化的程序，从当时人们对现在已经散佚的元丰令中有关不同灾害等级使用不同救灾办法（即灾害分法）的记载来看，国家已经对灾害赈救的程序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清代则是将这些程序进行了细化。如北宋灾害赈救根据饥馑的不同程度，基本分为三个标准，即平价卖粮的赈粟、政府提供无息借贷的赈贷和政府提供免费救助的赈济。^①而到了清代，政府救荒变成了四等，即大赈、普赈、急赈、加赈，并且赈救等级与具体赈救办法分离，使得不同赈救等级对应的赈救办法越来越多，用粮或用钱、用小米或用高粱、施粥、平糶、蠲免、倚阁、蠲逋、资送、留养、以工代赈等，常规赈救等级和应急办法的出台，加上不同层次具体救荒措施的运用，使政府救荒变得更加立体化。

横向比较是这部著作荒政研究的一个特色。单纯考核一个区域政府救荒情况，很难说明政府措施的有效程度，因为在缺乏参照物的情况下，任何事物的运动情况就会变得无法考量，政府的救荒绩效也是如此。李明珠教授用饥馑发生时的物价变动情况作为标准，以西方为参照，对清政府的救荒绩效进行分析，认为：乾隆时期直隶歉收所导致的粮价上涨约 20%—70%，这个区间的高限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数据，但是较之欧洲在最严重的饥荒时粮价涨二至四倍而言，即便是 70% 的上涨率也显得微不足道。进而她将乾隆末

^① 在译者石涛出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7FZS003）《北宋的自然灾害与政府管理体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中有详细的论述。

期以后政府赈灾力度锐减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意志愈来愈弱、人口压力、环境恶化及国家财政困难等。但事实上，乾隆时期政府财政对灾害的过度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嘉道时期政府的救荒能力，政府作为不充分更多出于一种无奈，而不仅仅是意志的消减。这一点通过水旱灾害与饥谨在爆发频次上的比较可以看出一些端倪。^①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政府对于灾害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灾害的影响，但是，就中国频繁发生的灾害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其消耗的社会财富总量却是巨大的，也就是说“假性市场整合”是建立在社会总财富无节制的消耗上。如果用长时段的环境史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政府的这种救荒活动与治河对环境的长期影响似乎又存在着异曲同工的关联，即短时段的稳定是以长时段的破坏为代价的。

纵向比较反映了灾害和救灾随时间推移而此消彼长。常平仓的功能在清代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饥谨预防措施变成了直接的救荒手段，中央政府在灾害发生时的职能也由原来的弭灾转向了原来主要由地方政府担当的减灾活动。李教授对赈灾论述的时间跨度大约为300年，涉及清代至20世纪末不同历史时期的救荒活动，并将前后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她指出，由于长期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水资源短缺至今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尽管有市场改革、法制改革与经济进步，国家在解决相关问题中的地位也不会消失。”^②

抛开上述论题涉及的李明珠教授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单就每章开头的学术史回顾来看，洋洋十二章的内容涉及几乎目前所有与灾害史研究有关的前期成果。因此，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认为，该书是目前灾害史研究中继马罗立、邓云特、王德毅、魏丕信等学者的研究之后^③，最具权威性的一部灾害史学综合性论著。

① 在《北宋的自然灾害与政府管理体系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

② Li, Lillian M.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1990s*: 376.

③ [美] 马罗立：《饥荒的中国》；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王德毅：《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中国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70年版；[法] 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四、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供给与需求作为一对矛盾，这一理论体系在运用到分析中国古代经济尤其是前近代和近代社会中时，出现了许多问题。以生产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早期研究和以生产力为主导的新兴研究，很难说明作为生产者的小农，其生产与生活间的关系问题，即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的诸多悖论现象。伊懋可的停滞说、李伯重的发展说以及黄宗智“内卷化”的调和说^①都无法解释无论农业生产力停滞还是发展，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问题所导致的贫富差异，足可以使财富拥有者转变自己的经营方向，将财富投入到生产领域，刺激生产的发展，从而完成近代化转型，而中国的结果正好相反的命题。受投资回报率稳定且居高不下的影响，土地流转对社会总财富的消耗可以算作一个因素，但这种影响是否足以阻碍财富拥有者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则又使研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彭慕兰将视角集中到经济核心区与能源产区的地理位置，以说明运输成本影响到中国近代化进程^②，但是，前清时期，山西商人从福建武夷山贩茶到恰克图行程4000多公里的事实说明，距离并不能阻碍人们对利润的追求。^③

供求是组成市场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研究供给还是需求，都是以交换为基础的。而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社会，所谓“自给自足”即是指生产者的产品主要用于满足自我生产生活需求，只有少量剩余产品转化为商品进入到市场，因此，从供求关系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忽略了满足个体生产生活需求以及储藏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在产品的分配中居于多数。这一点在中国中央集权制社会早期体现得更加明显。

受李明珠教授把市场与生产作为衡量灾害标准的启发，我们考虑是否能够将流通与生产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主线。商业是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

① 参见伊懋可的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李伯重的《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② [美]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③ 石涛、李志芳：《清代晋商茶叶贸易的定量分析：以嘉庆朝为例》，《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81—95页。

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我国是否起到了相类似的作用？单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考虑中国近代化迟滞的原因是否有失偏颇？

商业的发展有两个必要条件，即生产在能够满足个体生活的同时有了剩余，即可供交换的物质；同时，社会分工的存在和资源禀赋原理的适用性，使交换成为可能。换言之，古代商业发展是由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所产生的足够可供交换的剩余劳动产品和不断扩大的交换需求所决定的。

那么，古代规模商业则应该是基于因生产力的扩张出现的剩余产品的扩张，以及运输能力提高所提供的跨地域交换的可能而发生的。也就是说，规模商业是剩余产品与区域资源禀赋原理的双重作用所形成的规模交换，其扩张是通过物流需求，渐积形成若干集散市场，进而在市场需求的作用下，形成的市场周边不同区域生产的专门化倾向，导致经济区域横向分工的日趋明显，需求模式逐渐被固定下来。因此，在决定规模商业的诸多因素中，最根本是剩余产品的扩张。

从长时段经济发展来看，在社会总财富和总人口有限增长的条件下，生产与流通之间应该有一个动态均衡点，两者围绕这一均衡点上下波动，并且这一波动有一个范围不大的域，这时，流通领域的发展会刺激生产领域，反之亦然。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理论上讲，当生产规模尚不足以支撑规模商业需要的足够的剩余产品时，规模商业也就不可能出现。如果在没有规模生产和规模剩余产品出现的情况下，规模商业的出现，对于整体社会经济来说，其拉动作用和阻碍作用孰大孰小，孰重孰轻呢？由于受到生产能力的局限，社会生产规模（指宏观上的生产规模，不涉及某一地区或群体）尚无法提供更多可供转化的劳动剩余时，过分发达的商业必将压迫商品生产者用于糊口的那部分产品，导致其生活贫困。因为，区域经济的横向分工，交换的扩大化，也会使商品生产者用于生活的消费成本提高速度远大于生产者的劳动收入增长的速度，进而使社会经济的基础部分——生产环节会出现有限萎缩，而如果市场继续扩大，这种萎缩也会随之加剧。也就是说，流通领域的发展已经大幅度超越了原有均衡的域值范围，为了达到新的均衡，生产领域则会向相反方向滑落。

这一命题用于分析中国古代经济现象可以得出这样两方面的结论：

其一，中国古代规模商业的出现大致可以看作是明代^①，其标志便是区域性商业群体的出现，如晋商、徽商等等。而促成其发展起来的因素看似十分偶然，即明代初年，为了防御蒙元遗族的南下，政府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不得已把原来属于官方独家收益的“盐”，部分分割给商人。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明政府在颁发盐引时，加重了对商人的课税，而商人则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会采取抬高销售价格的方法保证高额或超额收益。作为生活必需品——“盐”的价格的提高，势必会导致其他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扬，从而导致生活消费成本的增加。但是，对于商业的纵容不仅仅只是在明代才开始出现，尽管古代一直贯彻着重农抑商的政策，但这一政策主要体现在政治和思想意识上，而实际财政政策上，政府为了节约财政成本和量出为入或量入为出的政策引导，税收货币化的倾向并没有考虑到作为生产和消费个体的纳税成本，商人在政府财政政策的引导下，成为唯一获利者。在前述推断成立的前提下，可以得出两方面的结论，首先，如果“重农抑商”政策能够在经济政策上得以实施，则这一政策是合理和符合客观实际的；其次，中国近代化没有从较为发达的商业中产生出来，规模商业的过分发达也是一重要因素。

其二，对于灾害影响来说，由于灾害发生导致区域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短缺，在市场的作用下，饥荒刺激了区域间的粮食和其他物品的流动，大量物资涌入受灾区域，自然会寻找合适的物资集散地，并由于惯性而形成区域交换市场。另外，政府对于灾害的赈救措施也在刺激市场的形成，由于政府赈救措施主要有赈粟、赈贷和赈济，而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无偿的赈济才会被政府所采用，而赈贷和赈粟则都与交换有关。在前述推断成立的前提下，由于古代社会经济的无序发展，灾害对古代社会经济的影响并不是暂时的经济萧条，更重要的破坏作用则是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农业、手工业与商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调，商业的发达，致使农业和手工业出现萎缩，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进步。

译者

2015年12月20日

^① [美]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第42—60页。